

畲族是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人口约为23万,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和安徽5个省60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其中以福建为最多,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他们的居住形式基本上是大散小聚,大都在一定范围内与汉族杂居一地。因此,同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历来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般说来,处在历史发展阶段中较进步、文明的民族对周边其他民族起着较大的影响作用。中原地区的汉族,从战国时期开始就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到了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由鼎盛阶段走向衰落。在其内部渐渐地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时期虽然畲族各居住区发展速度快慢不一,但基本上不同程度地封建化了。这是由于畲族名称自南宋出现在文献资料以来,就是采用大散小聚同汉族杂居的方式生活在江南地区。其社会发展,除内在因素外,受汉族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元一统志》就明载:有元一代,汉畲两族穷苦百姓在山区“党与相聚,声势相倚”。生产力水平相当发展。明、清时期基本保持了宋、元时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畲族山歌对此男耕女织的生活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田地作伴中心,打鼓亦爱打当心,作田亦爱勤使力,勤耕苦作有收成……田睦一行连一行,思想作水引禾行,算来作田实在好,勤耕苦作居满仓。”^①史上亦载:畲族妇女“织绩麻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这种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是建立在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的基础上的。明清时期,畲族于山岳带利用同汉人交换来的铁制工具,开山劈岭,修造田园,把山谷

岗麓地带“皆治为陇亩”,并且采取多种办法改良土壤,增加农作物种类,发展农业生产,改变了过去“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去”,“随山种谷,去瘠就腴”^②的经营方式,开始在各地山区定居下来。

随着畲族地区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发展,明、清时期畲民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贫富距离逐步扩大。大多数畲民,就其生产资料看,均属佃农阶层,如闽北岭乡“全乡虽有三十几户(畲民),但是自己耕的尚不到半数”,长泰寮头乡畲民亦“均为佃农”,^③同时代的屠本仁亦云:畲人“盖佃作之氓,男女皆力穡,时或负薪鬻于市”。但同时也出现少量畲族地主。^④据《宣平蓝氏宗谱》记载:明万历初年,浙江宣平县已有古地六、七十亩的蓝姓畲族地主。

明清时期,畲族社会普遍出现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广大畲族农民缺乏生产资料,生活陷于极端贫困境地,只好不得不依附于豪绅地主。明正德,广东畲民被南池“世家”招募“盗耕”番山县南三灶的封建政府禁地三百余顷。嘉靖十五年,又有一批畲民被迫听命于世家大族,而“霸耕”南三灶都里排的土地。^⑤许多畲民还直接向汉族地主租种土地而沦为佃户。如处州“佃户多是盘瓠种”,建阳畲民“所耕田皆改人业”^⑥他们通常以实物或货币交纳地租,其中以前者居多。乾隆四十二年,福安畲民蓝有盛向汉族地主林玉方租种五斗的水田,而约收成时主佃当场均分。^⑦道光十四年畲民蓝奶头向汉族地主刘孔秀承租山园一坪,而约年租谷六十六斤。由此可见地主向畲族农民征收的实物地租是相当苛重的。苛重的地租甚

明清时期的畲族社会

郑 鏞

至使畬民衣食无着,只好长期靠借高利贷过日子“未获之先或屡贷于人,则余谷仅足偿逋负”^⑨畬民除了被地主明火持仗的剥削外,还受于巧取豪夺“各山主倍收租利,加派粮差”以致恶性循环。更加贫困。因此,他们在山歌中沉痛悲愤地控诉道:“好伤心、新谷刚收又缺粮,孩子饿得哭爷娘,大人饿得泪汪汪。”^⑩

明清时期,封建王朝还改变过去“畬民不役”“畬民不税”的作法,在畬族地区普遍实行“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政策。政府还利用畬族中的“畬长”“零官”对畬民进行羁縻统治。这样,畬民又被套上超经济剥削的桎梏,不但“力役亦视平民”,而且还不得不利用自己“善射猎”的一技之长,出没深山老林猎获禽兽以为贡物。^⑪“明初设抚瑶土官,使绥靖之,略赋山猓,羁縻不已,其赋籍则论力若干出赋若干,或官府有征剿,悉听调用。若索取山兽皮张,使其流离不得安生”。^⑫德化县的畬民“入清遂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别”^⑬这种封建的超经济强制进一步说明了明清时期的畬族社会性质。

畬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被迫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地主当长工、短工,以谋取最起码的生活资料。处在贫困境地的畬民百姓,对封建制度和地主官吏仇恨至极,他们用山歌对剥削者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官主压榨似虎狼,刮得畬家无粒粮。年头忙到年尾底,日日清水灌肚肠。”

在封建制度的重压下,畬民们向往着那美好的生活:“封金山上好田场,三万七千串心垌;新开田地没租税,冬来收得谷满仓。封金山上树木黄,松树杂木满山藏;山上地盘十分好,年长月久采不完。封金山上好世界,蓝雷钟姓人丁齐,掌落封金开田地,开出田地作世界”这首《封金山》道出了畬民对土地的渴念,表达了他们对无压迫

无剥削社会的憧憬。明清时期畬民要求财产公有,要求人与人有平等,要求人人同等劳动的平等思想是封建时代的农民固有思想,正如列宁说:“是表现着反封建反农奴制不平等关系的斗争。”^⑭

为了实现没有剥削掠夺、人人丰衣足食的社会,畬族人民不断地起来反抗封建统治。从文献资料上统计,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至明崇祯五年(1632年)就爆发了七次以上的畬民起义。清初闽、浙、赣等省的畬民也多次揭竿而起,密切地配合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东南海上义师的抗清斗争。在畬、汉等族农民的打击下,明、清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如明王朝镇压赣南畬民起义后,就对地区无田地之民拨予田地;缺乏耕牛农具之民发给商税银,以资购置;缺乏粮食之民,发给少量的盐米等生活必需品,入清一些地区的官府对畬民“脱遇荒歉,民食其竭,济哉”^⑮这些措施的实行,一方面使畬民得以按照小农的经营方式生存下去,一方面也使畬族社会进一步封建化。

以上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的畬族社会。当我们把视线移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时,得到的是相同结论。明清时期畬民要求有读书应科举权利,畬民习俗的改变以及部分山歌的出现均反映出他们的封建意识。

长期以来,畬民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文化上也受到严重歧视。封建统治者把他们视为化外之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准他们进学校读书和参加科举。所以直到乾隆年间畬族仍是“识字者绝少”^⑯,但是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畬民要求得到读书、应科举权利的愿望表现得愈强烈。连他们结婚时都唱出这样的祝酒辞:“一双红烛长又长,一对旗杆在门堂、旗杆又加鲤鱼斗,秀才加上状元郎。”畬族上层分子更是迫切要

求加入封建政权。如嘉庆初,福鼎县童生、畬民钟良弼上书“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畬民不准与试”^①。有的干脆背宗叛祖,矢口否认自己是“盘瓠种”了事。因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从明代“其酋亦有辨华文者”^②到清代变为畬族中的许多上层分子“司举文业,出而应试”^③。“雷、蓝二姓间或侨居省城,且有捷乡会试登科第者。”^④漳浦县甚至还出现了名垂青史的畬族学者蓝鼎元,在哲学、经济学、法学等方面多有建树,是清初有为的地方官,被《清史稿》列入“循吏传”。史实说明,明、清时期的畬族社会在文化上的封建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

明、清时期,在畬族地区还出现了许多宣扬封建的忠、孝、贤、节等伦理道德的山歌。如《二十四孝》、《七十二贤人》、《一大富贵》等。这些山歌宣扬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礼教,正是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说成是天经地义、永世不变的道德规范。因此,此类山歌的流传对维护封建道德观念有一定作用。与此同时,畬民的习俗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在婚姻方面从“其姓为盘、蓝、雷、钟、自相婚姻,土人与邻者亦不与通婚”,“不冠不履,三姓为婚!”^⑤改变为“弥来与居民通婚,改其焚尸浮葬之习”^⑥。“近惟嘉禾一带畬民大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线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居室仍在辟地,然规模亦稍轩敞,妻或无子亦娶妾。”^⑦

综观中国社会从十六世纪起至十九世纪,历史已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提高,社会地域性的分工已较为明显,工商业的城镇日益兴起,白银渐成各地流通的货币。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这种发展无疑地会波及到畬族地区,对其经济生活起着刺激作用。

约从明初以来,闽、浙等地的畬民就已

开垦荒地,种植青靛。福建畬民的普遍种菁,使明代以来“福建菁”名闻全国,所谓“福州西南,蓝甲天下。”尤其是兴化畬、汉人民“擅蓝靛之利”。

畬族地区种植茶叶也较普遍。畬族山歌中有大量的关于茶叶内容的作品《采茶歌》、《茶盆歌》《茶花令》等。广东畬民种植的“洪拳茶”品种优良,闽北畬民所产的武夷茶,“其品最佳”,驰名海内外。

从当时畬族地区的商品生产看,由于受到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明清时期畬族社会内部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趋向。这一时期福建浙江等地还存在畬族“男女时为人雇工”的现象,他们“无田可耕,惟俸给于富户雇工”这说明了畬族社会的小农经济正在发生初步解体。诚然,资本主义萌芽在畬族社会中表现得十分微弱,但已足以进一步说明明清时期的社会性质了。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

注释: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漳州谕俗记》云:“凡洞种类不一、……在漳者日畬……畬民不役,畬民不税……”

②《畬族山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四辑“杂歌和盘古歌”中之《种田歌》

③管长壖《畬族社会经济》—《福建之畬族》

④光绪《处州府志》卷三十,《讨篇》

⑤1937年《重修宣平蓝氏宗谱》卷一

⑥⑪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十《广东》

⑦⑨道光《建阳县志》卷二,《畬民风俗》

⑧《福安地区土地买卖典押租佃契约》

⑩《畬族山歌》四辑

(下转第61页)

年满受职……在京七十余司，大率司引九人，更一二载后，年别即有六百余人输利受职。”而这批人“主于估贩，志意分毫之末，耳目塵肆之间”，“习以性成，惯于求利，苛得无耻，莫蹈廉隅”，使其居官，从何而可“治致升平”？褚氏对太宗说：“臣每周游人间，为国视听，京司寮庶，爰及外官，异口同词，皆言不便”。说明朝廷内外对“捉钱”充京官月俸之制所产生的政治负效应都极为关注。其二是“患及于民”，增加社会的动荡因素。崔沔就此分析说：“顷以州县典吏，并捉官钱，收利数多，破产者众。散诸编户，本少利轻，民用不休，时以为便，付本收利，患及于民……天下州县，积数既多，大抵皆然，为害不少。且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在于平民，已为重赋。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伤民刻下，俱在其中”^③。相形之下，户税是一项“依户次（户等），贫富有殊”的资产税，在封建社会是一种远比人头税合理的税制。因此，唐前期内外官员的俸料钱，先后由置本“捉钱”分充的预算外收支计划形态，演变为由相应设置的户税收入支付的预算内计划形态，不仅提高了国家预算的周密性程度，而且具有多方面的积极的社会影响。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注：

- ①⑩⑪《唐会要》卷91崔沔《议州县官月料钱状》。
- ②参见拙文《唐代前期预算外收支计划述略》（《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 ③④⑤《通典》卷35《禄秩》。按，《唐会要》卷91等史籍把褚遂良上疏时间记为贞观十二年二月，但据《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褚氏于十五年方迁任谏议大夫，故当以《通典》为是。
- ⑥《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
- ⑦参见刘海峰：《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
- ⑧⑨⑪⑫⑬⑭《唐会要》卷91《内外官料钱上》。
- ⑮参见马世长：《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廨本钱》（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 ⑯参见《文史》第13、14辑连载之吴震文。
- ⑰《全唐文》卷25。
- ⑱胡寄窗、谈敏著《中国财政思想史》第31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 ⑲参见《唐会要》卷83《租税上》所载元和四年十二月度支奏事。
- ⑳限于篇幅，具体推算过程从略。

（上接第64页）

- | | |
|--------------------------------------|---------------------------------|
| ⑫《云肖厅志》卷三“獐獐”。 | ⑰民国十六年《德化县志》卷三风俗志。 |
| ⑬⑭《德化县志》卷三“风俗志”。 | ⑱⑲民国《建阳县志》卷八，礼俗，“畬民风俗”。 |
| ⑮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 ⑳《侯官县乡土志》卷五人类。 |
| ⑯光緒《福安县志》卷七，物产。 | 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广东上》，卷一百三“广东下” |
| ⑰光緒《处州府志》卷30，吴楚椿《畬民考》。 | |